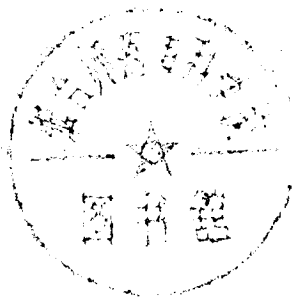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二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1.37
5068 文史資料出版社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選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

.....侯鏡如 覃异之 廖运泽(1)

江阴要塞解放的片断.....梅含章(30)

蒋军长江败退和淞沪溃逃的狼狈情形.....施有仁(37)

蒋军五十一军上海被歼记.....金 鉞(48)

国民党统帅部关于京沪杭作战的决策和

爭吵.....唐 文(57)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劫掠和

大屠杀.....郭 旭(62)

1949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张丰曹(69)

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刘 斐(95)

和谈前夕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李宗仁的

备战部署.....宋希濂(109)

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沈 醉(118)

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李以助(122)

蒋介石做总统的一个片断.....胡次威(153)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琐记.....王捷三(161)

孙科、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形形色色.....周一志(169)

“中原王”湯恩伯.....文 强(179)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沈 醉(213)

附注

对《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五一页。

对《“中原王”汤恩伯》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八〇页。

蔣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掙扎

侯鏡如 覃異之 廖運澤

前 言

京沪杭之战，是人民解放軍百万大軍下江南所进行的規模比較大的一次战役，也是蔣介石王朝最后掙扎的一次大战。这一战結束了蔣介石王朝二十二年的血腥統治，因此在历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我們三人都是蔣介石的嫡系將領，又都參加蔣介石这一最后掙扎的大战，那时候鏡如任蔣軍十七兵团司令，覃异之任蔣軍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廖运泽先后任第七綏靖区及第九編练司令部副司令，又都先后投向人民。茲將我們在这一战役中所見所聞，及从各有关方面所得的資料，綜合写成此篇史料。但我們接触的范围有限，所記遺漏和錯誤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讀者予以指正补充。又此稿曾蒙李以飭先生核正若干材料，附此致謝。

一 从淮海战役中的滁县指揮所說起

南京卫戍总部滁县指揮所，是負責南京卫戍区长江以北地域指揮任务的单位，所轄地域包括津浦路明光以南、东自江苏的仪征、西至安徽的定远等十余县。指揮所除了一个卫兵連外，沒有固定的建制部队。津浦路蚌埠至浦口段的护路任务，由交警总队担

任，平时不归卫戍总部指挥。1948年11月下旬，淮海战役紧张之际，覃异之担任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兼滁县指挥所主任。在此期间，先后归指挥所指挥的部队有：袁英的暂编第七师，罗贤达的六十六军，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杨幹才的二十军等。当时滁县指挥所防区内没有人民解放军，只有江淮军区孙傅家的游击总队。淮海会战愈紧张，江淮军区的游击部队也愈活跃，津浦路蚌埠滁县段的铁路常被破坏，各县地方团队常遭袭击，蒋军东奔西跑，疲于奔命。12月16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召覃异之到国防部，当面指示说：“黄维兵团昨天垮了。刘总司令（刘峙）即由蚌埠移到滁县。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正由无锡开滁县，归你指挥。另外给你交警总队一个团，由你负责掩护刘总部的转移。你可乘飞机到蚌埠走一趟，和刘总司令及李延年兵团（第六兵团）联系后，迅速开始行动。”覃在蚌埠机场遇见黄维兵团的副司令胡璉，他于15日才由双堆集逃跑出来，等候飞机去南京。胡垂头丧气地对覃说：“这回老本都搞光了。黄维的下落还不明，我是乘坦克冲出来的。”

覃见了刘峙和他的参谋长，研究当时的情况，一致认为杜聿明的部队未被歼灭以前，解放军主力南下的可能性不大。只要有适当兵力作妥善部署，由蚌埠到滁县，行车的安全是无问题的。

在蚌埠，李延年请覃吃饭，李穿长袍，仍然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私下批评刘峙说：“我们这位刘老师（刘曾在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既无办法，又无决心，和他在一起打仗，真把人气死。”晚间，九十六军政工处还举行跳舞会，舞伴多数是些妓女。临解放前的蚌埠，蒋军高级人员还是大吃大喝。有人开玩笑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确是当时普遍的现象。大约12月下旬，刘峙的总部开始由蚌埠撤退，李延年兵团的主力也逐步南移，覃把掩护部队布置在铁道

兩旁，一部分占領陣地，一部分游動“掃蕩”。當時除在張八嶺附近發生一場比較激烈的戰鬥外，其他各地只有零星戰鬥。劉峙到滁縣的第二天，覃還陪他及總部的幕僚人員游覽了滁縣附近的名勝。覃在豐樂亭上曾寫了一首五絕：“當年豐樂土，今日遍狼烟，空有遺碑在，登臨一黯然。”大有此游之後，不知何日能再來之感！劉峙還犒賞覃所指揮的官兵每人銀洋二元。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所率領之部隊被殲滅，徐州“剿總”撤銷。李延年兵團於1月19日炸燬淮河大鐵橋以後，由蚌埠南撤。滁縣指揮所在這期間，不斷接到各县縣長告急求援的電話。這時只有楊幹才的第二十軍在滁縣掩護李延年兵團的撤退，根本無力照顧各县。第六兵團南撤後，滁縣指揮所即撤銷，江北地區防務由第六兵團負責。

二 淮海戰役後南京反動集團的種種矛盾

黃維兵團被殲滅的消息傳到南京，蔣介石反動集團希望在徐州蚌埠地區打一個勝仗以穩定戰局的幻想破滅了，大家都預料杜聿明部也將很快地被殲滅。當時反動集團內部，真是人心惶惶，蔣軍高級將領對蔣介石1949年元旦的“求和”聲明，寄以很大的希望。當時覃異之還在滁縣指揮所，元旦前夕接到衛戍總司令張耀明的電話說：“請你注意收聽明天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將有重要的新聞發表。”劉峙總部秘書長劉子清也接到南京打來同樣的電話，足見大家對這個聲明多麼關心。可是蔣介石的欺騙手法，是瞞不過廣大人民的。1月14日毛主席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和談八條件，南京集團的反動頭目大為不安。湯恩伯曾對覃異之說：“毛澤東的聲明，把我們都列為戰犯，使大家都知道，除了堅決死戰之外，沒有別的出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沒有信心，他說：“從湖口到

上海共七百九十里，只有十八个軍，光靠軍隊防守是不夠的，必須組織地方民兵配合才行。南京衛戍總司令部可從組織民衆方面做點工作。”湯的副總司令萬建藩對覃說：“如果不打徐蚌會戰（淮海會戰），今天我們守長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見戰略上決策的錯誤，影響太大了。”在軍事緊張的同時，反動派內部的矛盾也更尖銳起來。其中最突出的是桂系與蔣介石圍繞着“利用和平談判作政治資本”所展開的勾心鬥角。

由於軍事上不斷遭到慘敗，蔣介石在反動集團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蔣管區的物價飛漲，人民反蔣運動日益高漲。在外交上，美國自杜魯門連任總統後，對於蔣介石更爲不滿，除了因為蔣介石這個傀儡的招牌已破產，需要培養新的奴才外，還因為杜魯門和杜威競選總統時，蔣介石錯誤地估計杜魯門必然失敗，企圖乘機拉攏杜威（蔣曾通過孔祥熙父子在美國花了許多錢幫助杜威），因而招致杜魯門的厭惡。在此種情況之下，李宗仁認爲是取蔣而代之的最好機會。蔣政權的許多高級軍政人員，也認爲李比蔣平易近人，希望李出來收拾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殘局。當時關麟征、覃異之等人在不同程度上也有這種看法。這是長期以來不滿意蔣介石過分重用浙江人（如陳誠、胡宗南、湯恩伯等）的積憤所促成的。就覃來說，對於蔣介石信仰的動搖，確是以後逐步投靠人民的開始。覃的日記上曾有這樣牢騷的詩句：“公卿皆貴戚（當時社會上流傳：‘蔣家天下陳家黨，孔宋財團浙江軍。’），國事日蠅蟻，有意歸田野，無心戀帝鄉。每因愁未盡，翻覺我難忘，驢武非長策，拔山笑霸王。”蔣幫將領這種普遍對蔣不滿的情緒，也增強了李宗仁取蔣而代之的信心。同時白崇禧在華中策動“五省聯盟”（廣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並通過湖北省參議會1948年12月25日致蔣介石電，提出“和平解決”主張，

目的是逼蔣下台，提高桂系地位，給蔣很大壓力。當時蔣介石非常憤慨，拍桌子大罵，說：“共產黨只要我的命，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錢。”（桂永清、湯恩伯都对覃談过这段故事。）蔣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被毛主席彻底揭穿其欺騙手法后，不得不于1月21日在謁中山陵之后，于下午4时10分乘专机黯然离开南京。

当时陪蔣謁中山陵的有南京政府一部分高級軍政人員，張耀明、覃异之、陈沛等还和蔣照了像。蔣曾对張等讲了話，大意是：“今天我們在軍事上虽然失敗，但是只要我們知耻，发奋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為我們还有长江以南及西南广大地区，比在黃埔革命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揚黃埔革命精神，团結起来，一定可以轉敗为胜。”我們送蔣走了之后，大家心里很难受，覃异之曾写了一首詩：“隔江烽火逼京都，立馬中原負霸圖（蔣介石客厅挂有于右任写的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馬定中原。”），惆悵秦淮拼一醉，自来难得是糊塗。”可見当时反动集团的沒落心情。

蔣介石下台前三日（1月18日）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发表湯恩伯专任总司令（撤銷衢县綏靖公署），实际是要湯恩伯統一指揮苏浙皖及贛东地区的軍事，积极布置湖口至上海的长江防务。同时蔣介石又派朱紹良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羣为重庆綏靖公署主任，余汉謀为广州綏靖公署主任，陈誠兼台湾警备司令。在这样的布置之下，蔣介石表面上虽然下野，实际仍能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从幕后操纵一切。

李宗仁上台后，于1月22日发表声明，愿意在中共所提出的八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談判。他們从各方面分头找中共負責人接头，除通过上海的民主人士找綫索外，还直接派人渡江找中共負責人接触。覃异之曾两次經手，秘密地把卫戍总部的通行証交給李宗仁

的亲信程思远。据程說：“德公(李宗仁)請李明揚过江去找陈毅，接洽直接談判和平問題。”在这期間，李宗仁曾約覃异之几次长談。談話內容，主要說明他的“民主”“和平”政綱，委婉地批評了蒋介石独裁带来的危机。覃表示坚决拥护李的“和談”主張。李曾考虑在和談进行中他个人的安全問題，原打算由安徽抽調桂系一个师來南京担任警卫，后来只來了一小部分队伍(好像不到一个团)。覃曾告訴李，四十五軍三一二师有一个团(团长張榮儒)是自己的可靠部属，李囑覃把这个团調來担任南京市的警备。(后来李由南京撤退，覃就由这个团中留下一个营負責維持过渡期間的秩序。)

覃从程思远处得知，在找中共进行和談的同时，李通过甘介侯与美国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挂上了鈎。很显然，李当时是一手抓“和談”，一手抓美援。在軍事方面，李也做了一些拉攏黃埔學生的工作。他当面夸奖关麟征为中国少有的优秀將領，并打算以关代替顧祝同为參謀总长。关亦认为李恢宏大度，礼賢下士，可以共事。后来关到溪口見蒋介石，把李的意見向蒋介石报告。蔣对关說：“这是别人对我们挑撥离間，不要上当。你是带兵的人，我已通知国防部要你担任陸軍总司令。”关到南京見顧祝同，顧对关說：“行政院孙院长在广州，未經国防部的同意，竟直接发表張发奎为陸軍总司令，这是从来没有的作法。你暫任陸軍副总司令，一两个月后，把張調开，由你接任。”由此可見，蒋介石下野后，孙科也想乘机通过張发奎來抓軍队。不久張被調为战略委员会委員，由关接任陸軍总司令。关从此即更靠攏李宗仁。后来在香港，关曾对覃大談其“反蔣不投共”的意見。

李宗仁为配合他的“和談”主張，也玩弄过一些假民主的花招。1月24日，他命令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一)把各地“剿匪”总部改

为軍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軍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釋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間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閉的报館杂志；(六)撤銷特种刑事法庭，廢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但1月26日的行政院會議上，除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外，表面上似乎都接受了李的指示。实际上，这批行政院的反动头目却从戒严法上玩弄阴谋，正如行政院的一个负责人說：“开釋政治犯与戒严系属二事。触犯戒严法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規定之事項，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負責当局，为維持治安与秩序起見，自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很显然，将政治性质事件引用所謂戒严法来处理，把所謂“政治犯”换上另一种“罪名”，也就可以不开釋了。事实也是这样，湯恩伯在2月11日发表談話，声称：“(一)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繼續执行戒严令。(二)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及聚众威胁情事。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动情事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軍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三)希望南京上海新聞界根据正确事实报道，以安民心。如有破坏政府全面和平主張，破坏軍事区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四)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沒有正式接到复刊許可时，不得复刊。”

当时南京上海有些人民团体，如中国人民和平促进会及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等，都是創議局部和平的，一部分輿論也拥护局部和平。而蔣介石即以“全面和平”作幌子来破坏“和談”。湯恩伯的談話就是针对“局部和平”主張者而发的，同时也是暗示抵制李宗仁的一些所謂民主措施。

李宗仁抓住“釋放政治犯”这个招牌，是用来提高自己打击蔣介石的威信，显示他比蔣介石开明，企图借此挽回国民党在蔣管区的人心。在这个問題上，覃异之是支持李宗仁的。南京卫戍总司令張耀明的态度是“不反对釋放政治犯，但是怕負責”。覃建議李宗仁給卫戍总部下手令釋放政治犯获得同意后，由覃根据手令以迅速的办法先釋放南京在押的政治犯約三百多名。湯恩伯对此大为不滿，派人到南京来查問。覃将李宗仁的手令拿出来，湯没办法，只得下令把南京的政治犯全部移往上海，归湯总部直接处理。当时覃之釋放政治犯，也有自己的打算，他看到国民党的政权已无法挽救了，想做几件有利于人民的事，为将来和平談判成功时，取得中共的諒解，以便得到較好的政治地位（当时还没有立功贖罪的認識）。

南京在解放前夕，社会秩序很混乱，物价一日数漲，街头巷尾銀元販充斥，伤兵到处鬧事，流氓地痞乘机杀人越貨，粮店被搶日有所聞。前方各部队被歼灭后逃到南京的軍官甚多，卫戍总部的軍官收容所人数不断增加。这些軍官生活甚苦，滿腹牢騷，常到外面滋事。此外，由于政府迁往广州，各部留京職員感到今后出路及生活都成問題，困难重重，先后分別組織联誼会，以便向政府要求发給应变費（被遣散的人員要求发給遣散費）。2月3日上午10时，各机关留京職員联誼会，在財政部大礼堂联合举行成立大会，由各单位派代表一人参加商討工作問題。主持大会的是財政部專員周臣千，到会代表竟有一百多人。因人多杂乱，身份无法鑑別，許多特务乘机混入，会場秩序无法維持，继之发生紛扰，一片喊打声，秩序大乱。警察局派武装警察到場彈压，中午始告安定。周臣千等数人被扣押，社会部一職員受伤。事后卫戍总部发言人罗春波（政工处长）发表談話，认为这个联誼会是非法組織，表示要严加取締。

在这期间，南京还曾发生过一次惊动京沪的“暴动案”。在2月上旬一次卫戍总部的会报会上（軍、警、宪负责人参加），警察厅长黄珍吾报告说：“最近在首都警察局中发现反动的秘密组织，宪兵第七团也有人参加。此案牵涉很广，最好由卫戍总部派负责人与宪警两单位共同处理。”当时决定派总部政工处长罗春波负责处理这一案件。事后了解这个案件的破获经过大致如下：

卫戍总部稽查处（軍統南京工作机关）发现孟士衡（东北人）活动的面很广，并知道孟是民革秘密组织的负责人，常出入光华門内大光新村二号吴士文家。东北籍特务秦范五与吴士文住一个院子，并参加孟等的组织。2月7日据秦范五密报，2月6日下午8时，孟士衡、吴士文、蕭儉魁（又名蕭成玉或蕭振青，宪兵七团逃兵，据说曾到江北与中共江淮军区取得联系）等在吴士文家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一次五千人的暴动，行动计划如下：（1）控制飞机场；（2）截断交通干线；（3）扣留李宗仁及其他重要军政人员；（4）成立南京人民解放委员会；（5）迎接解放军渡江。他们决定以两千人在市内暴动，以三千人迎接解放军渡江。2月9日孟士衡到上海，2月10日罗春波派政工处上校附员馬志青（东北籍）追踪到上海。11日馬把孟从曲友誠家騙出来将孟逮捕，并于11、12两日，先后逮捕蕭儉魁、馬駿名、吳士文、王鼎臣，15日逮捕夏奉瑛等。

在此案发现之前，警察厅长黄珍吾，因送家眷南逃，用公家汽车将家具细软运走，被警察巡官扣留。《南京晚报》用大字标题报道这一新闻。黄见报大发雷霆，勒令《南京晚报》停刊，经该报负责人找草草之转圜，才许复刊。黄因此怀疑警察局内部有问题，一面扣押和他捣乱的警察巡官，一面深入调查警察局内部的情形。终于发现南京中区警察局局长馬某及北区警察局局长刘某，均与孟士衡

有联系，先后扣押局长以下十余人（其中有一局长自首）。同时宪兵方面也扣押了宪兵第七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二十余人。4月4日湯恩伯命令将孟士衡等押往上海，交其总部处理。民革京沪负责人王葆真亦因此案牵连，在上海被湯恩伯扣押。5月9日，孟士衡，吳士文、蕭儉魁等，以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罪名，被湯恩伯、毛森所杀害。

反动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嫡系部队也动摇起来。大约在2、3月間（确切日期忘记了）的一个上午，張耀明对覃异之說：“据稽查处（軍統）方面的情报，四十五軍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有通敌嫌疑，請你約他来总部談一談。”覃說：“王是軍校学生，又在陆大毕业，必須謹慎处理，如果搞錯了，将影响高級軍官的情緒。”当天中午覃正在和王彥清談話，忽接湯恩伯的電話，要卫戍总部把王扣押待查。覃即告訴王，囑其赶快逃走，然后以電話报告湯恩伯說：“王彥清回师部去了，已电赵震軍长就近办理。”当天晚上王彥清即以奉命过江演习为名，把部队拉跑。因这个部队是由蒋介石的警卫旅編成，王不容易拉走，天亮后蔣軍派飞机投下傳单，各团就陸續回来了，王只带几个卫士逃到江北解放区。赵震因此被撤职查办，以卫戍副总司令陈沛兼任四十五軍軍长。此案发生后，国防部大为震動，蒋介石也从溪口打電話来查問。

4月1日，南京曾发生血案，学生死伤不少。自北平和平解放后，南京人心受到很大影响，各大学学生反征兵、反征粮、反征实、反美援、反假和平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据張耀明說：“关于学生游行問題，李宗仁曾召集各大学校长及首都軍、警、宪和国防部有关单位，开了一个会。我是不同意学生游行的。我主張把学生圍困在学校里，以免出問題。李宗仁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說：‘我在北平就让学生游行，并未发生什么事故。学生們有一股热忱，你越压迫，

他們反抗越大，給他們游行出出氣，有什麼關係。’鄧文儀（國防部政工局長）在會上說：‘學生游行，軍官總隊也游行怎麼辦？’李說：‘讓他們分開游行好了。’各大學校長多半同意李的意見。”

在此之前若干日以來，軍官收容所政治隊的軍官（政工干部編成，鄧文儀、羅春波直接操縱），曾不斷和劇專學生的“活報劇宣傳隊”發生衝突。這些政工特務們常到劇專學校去搗亂。鄧文儀不止一次表示，要“以羣眾運動對付羣眾運動”。因此張耀明堅決主張使兩者分別游行，以免衝突。張和鄧文儀反復交涉，結果軍官總隊提前游行。

4月1日，各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和職工一万余人游行。在游行中並未發生什麼事故，不料參加游行的劇專同學乘校車返校至白下路大中橋時，竟受到駐在該地附近的軍官總隊特務們的毒打。其他學校學生聞訊，趕來聲援，並到總統府請願，亦遭毒打。政大司機陳祝三當場被打死，屍體被特務劫去。覃異之聞訊，即到衛戍總部，見特務們抓來劇專學院師生數名，其中有陳仲宣教師在內。特務聲勢汹汹地叫嚷：“抓到幾名搗亂的共產黨了。”覃當即問明情況，知是特務們胡作非為，立即釋放被捕師生。這一天，總計被傷害的學生達二百餘名。4月2日，中央大學物理系學生陳履繹，因傷不治身死（據說19日又有一名因傷不治身死）。張耀明星夜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控制電訊，封鎖新聞，並決定以“互毆”來掩蓋事實真相，推卸罪責。事後張耀明發牢騷說：“鄧文儀給我們添麻煩，真混蛋。”

李宗仁取得代總統後，一手玩弄“和談”，一手勾結美國，目的是爭取時間，逐步鞏固其已得的地位。桂系重要將領夏威（安徽省主席兼第八綏靖區司令），3月初在漢口發表談話，強調“划黃河而治”，正是代表桂系的主張。蔣介石將計就計讓李出面周旋，爭取三

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訓練出二百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当时蔣管区后方正加强征集及訓練新兵，如南京有王敬久的編练司令部，浙江有張雪中的編练司令部，江西有胡璉及沈发藻的两个編练司令部，湖南有黃杰的編练司令部，四川有罗广文的編练司令部，台湾有孙立人的編练司令部等等。針對蔣李“緩兵計”的阴谋，毛主席于4月4日发表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告里宣布：“人民解放軍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話吓你們，无论你們簽訂接受八項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簽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軍总是要前进的。”这正击中蔣李阴谋的要害。

4月16日，黃紹竑携带和平条款回南京請示。4月18日，据程思远向覃异之透露，李宗仁、白崇禧曾召集桂系重要人物黃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等开秘密會議，听取和討論黃紹竑关于进行和談的报告。在会上，白崇禧坚决反对簽字。李宗仁沉默許久，最后表示向溪口請示才能决定。覃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去找白崇禧（覃与白是邻居），探問究竟。白說：“我們决不能在这个断送国民党江山的条款上簽字。”覃說：“这个江山簽字也完了，不簽也完了。”白很严肃地說：“我們不簽字，在将来的历史上就不負这个責任。”覃未再說，心里想将来的历史絕不是国民党写，而是共产党写。覃又去見李宗仁，李表示目前簽字有困难。看他当时的意思，似乎在蔣介石控制下有不能簽字的苦衷。李說：“我絕不会把战争帶到广西去，我一定要对得起广西父老。”覃曾幻想广西有局部和平的可能，内心頗为快慰，因为他的家眷正在广西宜山家乡。李回到桂林后，最初表示消极，实际是和蔣介石討价还价，因此在蔣介石同意給以軍队指揮权、經濟支配权、用人行政权等之后，便和吳鉄城等由广州去“促駕”的人，一道乘专机飞广州，繼續反共去了。后来事实

証明，李宗仁仍然指揮不動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當解放軍向粵北進軍時，李宗仁曾命駐海南島的二十三兵團劉安祺部增援粵北，而蔣介石卻密令劉安祺開往潮汕，準備運往台灣。李對劉的“擅自”行動，雖嚴令申斥，並予以記大過的處分，但亦无可奈何。這是劉在廣州時當面對覃談的。覃對李宗仁的幻想又一次破滅，匆匆把家搬到香港，並和黃紹竑等四十三人在香港通電起義，從此走向光明。

三 長江防綫的崩潰

蔣介石於1月21日下野，25日就在溪口召見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等，指示關於長江的布防問題，決定把長江防綫劃分為兩大戰區：湖口以西歸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指揮，其兵力有四十個師，約二十五萬人；湖口以東歸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其兵力有七十五個師，約四十五萬人。會後蔣派專人把作戰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執行，但將湖口以東的具体作戰計劃則保守秘密。

京滬杭戰區的作戰方針大致是：以長江防綫為外圍，以滬杭三角地帶為重點，以淞滬為核心，採取持久防禦方針，最後堅守淞滬，與台灣相呼應。他們的如意算盤是以優勢海空軍從台灣支援淞滬，然後待機反攻。這個作戰方針，李宗仁、白崇禧都不知道。李上台後，曾指示南京衛戍總部，作防守南京的計劃，並令國防部撥款構築防禦工事。他不知道湯恩伯正在秘密地將江寧要塞的大炮拆運上海。南京孝陵衛湯總部的指揮所，經常控制着一、二百輛卡車，準備隨時離開，根本沒有守南京的打算。國防部的某些負責人，也不知道這個方針的內容。在國防部開會研究長江作戰計劃時，湯恩伯根據蔣的指示，提出把主力放在鎮江以東地區的方案時，遭到第三廳廳長蔡文治的反對。蔡從全盤作戰方略來考慮，主張防守重點